

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与五次统一战线

周恩来亲身参加了两次国共合作。《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出版说明指出：“周恩来同志在他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愧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本文按我国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通过周恩来与五次统一战线的关系论述他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一、积极参与和组织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2年7月，为解决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认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①这是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郑重形式，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8月，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496页。

后，陈独秀、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拜访了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赶出广东而迁避上海的孙中山，向他说明上述主张。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筹备改组国民党。

当时，周恩来在法国是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他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在法国协助国民党总部代表王京岐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1923年3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派代表到里昂和国民党代表进一步商讨，积极准备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国民党旅欧支部。6月，周恩来与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王京岐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青年团员80余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随着国民党旅欧支部筹建工作的开展，是年秋，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11月，国民党驻欧支部在里昂正式成立，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后来，在执行部部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他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实际责任。^①

在这期间，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他们与反共杂志《先声》互相勾结，攻击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带领旅欧党团组织，以《赤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24年秋，周恩来奉党中央的指示回国，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稍后，他又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参加平定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等职，身处国共合作的革命斗争第一线，成绩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卓著。

可以看出，在党明确提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组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高层决策人

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而破裂。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开始了在农村独立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范围缩小了，成为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1年。

在这段时期内，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此后不久，他调到中央工作，指导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为探索和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27年11月2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职工运动决议案时，周恩来指出：目前是如何发展经济斗争，反对黄色工会的问题，要说明各地过去忽视职工运动是主要的毛病，工人阶级要加强自身的团结。

1930年1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报告了起草《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的决议》的情况。在谈到改组派利用小资产阶级问题时说，关于小资产阶级应该分上层与下层，我们应注意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没有店员的小商人、贫农、零工、学生等。学生是城市工人的同盟军，我们要吸引学生参加革命；在策略上，不能将阶级斗争的方式运用到学生群众中去，我们只能以革命的纲领来争取学生

的大多数。^①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提出这样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周恩来在实践上，更是身体力行，发展和壮大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为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 推动者、发展者与维系者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就此写了数篇短文，认为民族矛盾已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他还参与了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制定。1934年初，当蒋介石调集军队进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时，他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密提议》的电报，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具体建议，体现了“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神”。^②7月15日，他又和毛、朱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③

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还艰苦跋涉在长征途中，周恩来已意识到华北危急，与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坚决对日作战”。^④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表明愿与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长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③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0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1页。

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参与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既表明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日趋一致，也为随后的瓦窑堡会议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12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周恩来在会上几次发言，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会后，周恩来以其主要精力贯彻会议精神，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首先选准了东北军这个突破口，成立了以他作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4月他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他又受中央委托，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并参与领导我党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针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在1936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和最明确地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合作同时又要反蒋的方针大大前进了一步。9月1日，周恩来致信陈果夫、陈立夫，表明中共“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①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方针的最早提出者，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他在9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要真正走向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之实现。9月22日，他再次致书陈立夫、陈果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共御强敌”。^①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这一突发事变，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作长篇发言，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地方军阀以及国际上种种力量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了共产党应采取的对策：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孤立何应钦，巩固我们的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对策是完全正确的。

会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事变，面临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许多事情得由周恩来临机处置。他以超人的才华和胆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他首先分别同张、杨举行会谈，认真听取他们关于发动事变的情况的介绍，肯定他们的爱国义举，仔细分析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开诚表明共产党的态度。周恩来再三强调应竭力避免内战，争取和平解决，从而实现全国团结。既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也使对放蒋有所顾虑的杨虎城茅塞顿开，心悦诚服。周恩来与代表团还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做张、杨两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地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23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同张、杨一起，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而周恩来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政治上的主宰者，是事实上的主谋。”张学良的这一评价再客观不过地说明了周恩来于其中的历史作用。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03 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促成两党合作的正式建立，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团首席代表，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奔走于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之间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五次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杰出的外交谈判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他既始终坚持民族利益第一的原则，又同国民党削弱控制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①从而巧妙地把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周恩来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庐山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事实说明周恩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完全实现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

在 1937 年 8 月下旬的中共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两党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发表了富有远见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前者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士路线；后者则强调应以极大的力量发展统一战线事业，保证前者的实现。为此，周恩来奔走山西、武汉等地积极从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党内，他参与领导中共长江局和外交代表团的工作；在党外，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这一时期，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同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等多次接触，给他们当时的政治倾向以较大影响；对国民党主战派的高级将领冯玉祥、白崇禧及川军、滇军的诸多将领做了大量的感化工作。他还广泛接触其他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95 页。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很多人了解了中共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这就为共产党在广大国统区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发展、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对后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一部分国民党将领的起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和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共产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的狭小范围走出来，踏上了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在更多的领域和战线更有成效地发展了国共合作的关系。他是当之无愧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深感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是它的最大威胁，于是把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与此相适应，国民党也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加紧了反共步骤；国共关系进入更加复杂的时期。在此后的长时间内，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主要负责同国民党谈判事宜的周恩来，运用他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外交才能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坚定灵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努力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逆流和投降的危险，为维系国共合作，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总之，周恩来不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是它的杰出发展者和坚强维系者。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大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继续巩固和维系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南京同国民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谈判。但因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独裁，大规模内战终于爆发。为了打垮国民党蒋介石，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

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周恩来则是这次统一战线的组织大师。

1946 年底，他兼任了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一方面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一方面精心指导国统区的革命运动，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学生、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形成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条战线（军事战线）密切配合，使国民党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随着解放战争出人预料的顺利发展，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已摆到了党的议事日程。1948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通电拥护。此后，周恩来耗费大量心血来安排大批民主人士从不同的路线进入解放区，并就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参加者范围等问题同他们进行充分的酝酿。9 月 26 日，党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周恩来虽不再兼任部长，但他仍用很大的精力领导和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49 年 6 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会议推进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8 月 26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委会初读通过了政协会议组织法，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被选为第一副主席，具体主持全国政协的工作。由于这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又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周恩来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统一战线面

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如怎样处理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如何搞好民族关系？怎样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周恩来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状，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他当时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五、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从 1956 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究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还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过去党的历史文献，包括周恩来的报告、演说在内，都表述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以为，把这一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表述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更准确。理由在于：其一，如同革命的性质主要是由革命的任务确定的一样，统一战线的性质也是由它在某一历史阶段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来确定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十年内战时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退出了革命，革命的任务除了反对封建压迫外，还要反抗国民党统治，统一战线的性质变成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性质又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那么，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到 1956 年我国已经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①既然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也应是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32 页。

社会主义的。其二，拿统一战线的构成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已经不能再说统一战线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阶级已同全体人民一起掌握了生产资料，它的领导权更巩固了，农民、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个体工商运输业者，等等）已经成为集体劳动者，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了。因此，就祖国大陆来说，统一战线已经变为基本上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统一战线。

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就容易理解周恩来这一历史阶段工作的贡献了。从 1954 年我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国家的政体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结束了它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它作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正是从同年起，周恩来连续担任了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直到他逝世。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周恩来都是当之无愧的组织者和卓越领导人。

当然，我国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发展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各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界和统战工作干部，都为克服暂时困难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与周恩来的卓越领导是分不开的。

第二阶段，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阶段，“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受到迫害和摧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被搞得七零八落。正如胡耀邦 1982 年 1 月《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

“说七零八落，意思就是还没有完全摧垮，还剩下二三成。怎么能够还剩下一点呢？这里要讲句公道话：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维护了一下，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维护了一批统一战线中的老朋友。”^①这个评价非常公允。“文革”之初，周恩来就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当“文革”狂潮翻滚，统一战线的众多盟友横遭厄运时，他又为党中央起草文件，明确规定了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而他具体和巧妙地保护统一战线盟友的动人事迹更是不胜枚举。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劫难中从周恩来身上再次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许多朋友虽然受到残酷迫害，但基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和衷心敬仰，仍然给予我党以谅解，继续同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初衷不变。胡厥文先生曾有如下肺腑之言：“从三十多年的接触中，我深深体会到，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而周恩来总理就是运用这个法宝最自觉、最娴熟、最有成效的共产党人之一。”^②这也表明，在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周恩来不仅是卓越的领导人，而且也是最有成效的维系者。

周恩来在组织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五次统一战线中建立的巨大功勋，是他伟大一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必将与他的名字一起彪炳青史！

（原载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3年第3期）

^①《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年11月版，第160页。

^②《统一战线的珍贵文献》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71页。

周恩来与香港回归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周恩来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振兴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在实践上、理论上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关于香港问题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见解，已经包含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思想内容。今天，在 13 亿炎黄子孙同庆香港回归之际，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无比正确性，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香港情结

周恩来一生到过香港的次数并不多，但也许是因为他生而具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香港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熟悉，更有一种亲切感。

1920 年 11 月初，由上海开往欧洲的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抵达香港，周恩来第一次踏上香港这块屈辱的土地。邮船在港停泊一日，这使得周恩来有机会对香港作一些初步了解。显然，周恩来此时情绪很低落，心情很沉重。“原来这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社会，尽管树木荫翳，商旅云集，可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却形成鲜明对照，持枪的廓尔雇佣兵四处游荡，大公司屋檐下，蜷缩着

贫病交加的黎民……’^①这就是失去主权的香港给周恩来的最初印象。从此，香港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1924年9月1日，从法国归国的周恩来抵达香港，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到达香港。四年的旅欧革命生涯，周恩来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他了解到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内出现一片大好革命形势时，他归心似箭，热切要求回国参加更直接的革命斗争。一到香港他就急切地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说明“自己须往广州一行，以后行动须俟 C·P（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我在广州的通讯地址，可由平山同志处转”。^②

周恩来第三次到达香港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因在率领部队撤退过程中患上严重疟疾，周恩来不得被转移到香港。在香港，连续的高烧，使周恩来常处于昏迷状态，广东省委派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请了医生来诊治。半个多月后，他的健康状况好转，开始能在别人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岛上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11月上旬，周恩来离开香港，参加上海中央紧急会议，与前两次停留香港相比，周恩来这一次滞留香港的时间之长、印象之深、情况之特殊，真可谓与香港结下了一场生死缘！

二、对香港回归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这块周恩来魂系梦牵的国土，究竟何去何从？新中国的诞生，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为了将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西方社会“三管齐下”，以政治孤立、

^① 《早年周恩来》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② 《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对待饱经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如何保卫和建设好新生的人民政权，周恩来想得很远。他知道，不采取灵活的政策，不把香港问题置入新的国际形势下慎重考虑，一切都将事与愿违。就这样，从实际出发，周恩来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提出了以下关于香港问题的新思考。

第一，主权一定要收回。在各种场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多次阐明对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西方列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香港问题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解决，实现恢复行使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1957年4月28日，在同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时，周恩来明确表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①暂时不收回并不是放弃对香港的主权，而是出于一种政治考虑。保留香港这个国际通道就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包围。实践证明，这是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

第二，香港要实行资本主义。这是周恩来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表现。周恩来认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生活方式，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②从历史上看，香港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英国在香港长期统治，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影响，在香港有深厚的利益，英国是不会轻易放弃香港的；从现状看，香港实行着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

^② 同上书，第353—354页。